



首为商战鼓与呼

盛世危言

郑观应著 王贻梁评注

中洲古籍

醒狮丛书

谢俊美 主编

盛世危言

郑观应著 王贻梁评注

责任编辑 张燕萍 责任校对 玉 清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625 印张 426 千字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200 册

ISBN7-5348-1715-3/C·10

定价：24.00 元

《醒狮丛书》总序

《醒狮丛书》就要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在这里我想说几句话。

1997年冬，中州古籍出版社的郭孟良先生和张燕萍女士风尘仆仆从郑州来到上海，邀我主编一套有关介绍近代思想家名著方面的丛书，想以此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近代国情的了解和认识，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所贡献。他们都是事业心很强的人，想法非常好。其实，江泽民主席近几年来一直要求我们加强近代史的学习，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们的编辑计划得到社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有鉴于此，我虽不才，最后还是答应下来了。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其次，我想要说的是，中州古籍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为什么要不惜花大力出版这类盈利不多的著作呢？我想自有他们的远见卓识和一番道理。

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项历史研究乃至出版计划，往往都是从现实社会需要出发，再到历史中寻求答案。随着社

会历史的飞速发展，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所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在思想文化领域，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内部资源的极度匮乏，不少人对于历史知之不多。由于多数中国人对“改革开放”的“变局”，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和理论上的探讨，因而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多次出现了历史上重复出现的现象：八九十年代，一部分知识分子先是鼓吹新儒学，大倡文化复兴，主张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化建设的动力。苏联解体后，一部分知识分子又鼓吹西方中心论，把西方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所谓方法论，乃至“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理论，也不顾这些理论原生的社会背景和具体的文化目标，一股脑儿地介绍到中国。其中有些理论、主张由于缺乏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不合中国国情，很快退出了文化舞台而销声匿迹。不过，透过这些言论、主张，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仍然没有超越近代史上中西文化之争这一范畴。从严格意义上说，今天思想文化领域的中西文化之争实际上是近代史上中西文化之争的延续和深化，是国人在国门打开后，有鉴于国际社会的科学技术高度发达，深感自己落后，急于寻求迅速改变现状这一背景下的产物。争论的表层好象是现代化问题，实际内里还是一个如何看待西方的近代文化和我们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的问题。

1840 年西方资本主义拍击中国的堤岸，进行殖民侵略，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近代文化，从船炮器械到声光化电之类的科学技术，从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到民主、人权乃至世界观、历史观、思维方式、价值标准等等，并日渐同

中国传统的文化发生抵触乃至冲撞，由此而引发了中西文化之争。由于民族战争的一再挫败，先进的知识分子经过深刻的反思之后，承认和看到了西方的长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魏源首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学习西方这一著名的历史课题。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围绕着学习西方，士大夫官僚知识分子先后提出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中西折衷调和、全盘西化等等主张。这些主张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争论，都是在近代中国国情制约下，特定思维模式的产物，它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了因“世变之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心路历程。

翻阅历史，我们发现，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过程中，常常为新的主张而陶醉，又常常为每一次新的迅即失却而变得痛苦不堪，并为企盼下一个更新的主张而激动不已。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了“采西学议”，王韬、郑观应公开鼓吹设议院，而容闳则干脆将他所了解和学到的西学知识投诸于他的斗争活动。然而随着甲午战败，洋务运动破产，人们对“中体西用”产生怀疑。在国家面临被瓜分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严复站在救亡图存的反侵略立场，译介了赫胥黎的《天演论》，搬来了西方的生物进化论，向人们大声疾呼：若再不变法，中国难逃“优胜劣败”、弱者灭亡的厄运。由此在中国社会上引起了强烈震撼。谭嗣同则提出冲决一切罗网的口号，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了维新变法，孙中山等发动和领导了反清

的辛亥革命,企图“西体中用”,即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来拯救民族危亡。然而变法的失败和革命的夭折,又一次使他们陷入痛苦和悲哀之中。在流亡异国的日子里,康有为撰述了《大同书》,企盼大同世界的出现,然而他乃至整个中国资产阶级始终也未找到一条实现大同的道路。20世纪初年,梁启超等人开始改变由原先对西方器物和制度的层面楔入进而深入到文化心理层面的认识,从中西间的形而下的比较进而采取形而上的比较,从而看到了西方的近代文化同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整体对立,发表了《新民说》,提出了国民性改造。孙中山在屡经挫败后,重新构思新的建国方略。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为代表则揭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发出塑造现代人格的呐喊,主张实行观念形态的革命,进行文化重建。新文化运动中除旧布新的若干内容,时至今日还灼然有华。近代史上中西文化的每一场争论,时而给人以惊吓,时而又给人以力量。这种争论构成了近代思想文化领域的绚丽多彩的画卷,有力地推动了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

近代史上的中西文化之争早已有了结论。历史告诉人们,东西方文化都有其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各有其成就和局限以及自身存在的价值,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近代史上先进知识分子为寻求真理而对中西文化进行对比、评判,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论,只是相对于现代化的目标而言,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远远落后于生活,接受和吸纳西方的近代文明是不可规避的事实,经过八十多年艰苦探索,直到五

五四运动前夜中国人终于找到了西方近代文化的最高结晶——马克思主义。又经过三十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结合，最后实现了民族独立，成功地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斗争活动以及他们对中西文化的不同认识和见解、主张，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仍不失其借鉴和启示，我想这大概就是出版社领导和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意图吧。

最后，从编辑本丛书而联想到今天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问题。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忧危国家的前途命运历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德。个人的历史可以有轻浅，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大业犹如大海巨川，波澜壮阔，汹涌向前。人文知识分子不应为目前的困难惆怅和忧伤，不应弃守自己的阵地，应当像历史上那些先进知识分子在民族的呻吟和独立富强的热望交织中，毅然决然投身社会，追踪时代，大胆探求真理。社会经济运作机制的大转变已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人文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一种守恒力量，唯一的出路就是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重塑自己，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重建贡献自己的聪明和才智。

让我们为繁荣祖国的文化学术事业共同努力吧。

谢俊美
1998年1月于沪上

目 录

醒狮丛书总序.....	谢俊美(1)
“七尺身躯大丈夫，百年世事竟如何” ——郑观应与《盛世危言》.....	王贻梁(1)
《盛世危言》自序	(50)
《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凡例	(53)
道 器	(56)
学校上	(60)
学校上	(66)
学校下	(69)
西 学	(73)
女 教	(79)
考试上	(83)
考试下	(88)
藏 书	(91)
议院上	(95)
议院下.....	(100)
公 举.....	(103)
原 君.....	(107)

自强论	(111)
日报上	(113)
日报下	(116)
吏治上	(119)
吏治下	(126)
典礼上	(134)
典礼下	(137)
游 历	(141)
公 法	(146)
通 使	(149)
禁烟上	(154)
禁烟下	(159)
传 教	(164)
传 教	(168)
贩 奴	(172)
交涉上	(175)
交涉下	(180)
条 约	(183)
人 籍	(187)
书 吏	(190)
阉 宦	(193)
廉 傅	(196)
限 仕	(198)
汰 冗	(202)
革 弊	(207)
建 都	(211)
户 口	(214)

旗籍	(217)
教养	(220)
训俗	(223)
刑法	(226)
狱囚	(230)
巡捕	(234)
罚赎	(240)
医道	(243)
善举	(247)
僧道	(254)
盗工	(260)
税则	(262)
厘捐	(266)
捐纳	(272)
停漕	(275)
盐务	(279)
度支	(285)
国债	(288)
商战上	(292)
商战下	(297)
商务一	(299)
商务二	(303)
商务三	(309)
商务四	(314)
商务五	(317)
商船上	(321)
商船下	(325)

保 险	(330)
铁路上	(333)
铁路下	(337)
修 路	(341)
电 报	(346)
邮政上	(350)
邮政下	(353)
驿 站	(357)
银行上	(360)
银行下	(364)
铸 银	(368)
圈 法	(372)
开矿上	(377)
开矿下	(381)
纺 织	(385)
技 艺	(389)
赛 会	(397)
农 功	(402)
垦 荒	(406)
旱 潦	(410)
治 河	(413)
海防上	(420)
海防中	(423)
海防下	(427)
边防一	(433)
边防二	(437)
边防三	(443)

边防四	(446)
边防五	(448)
边防六	(452)
边防六	(457)
边防七	(462)
边防八	(466)
边防八	(473)
边防九	(476)
江 防	(481)
炮 台	(484)
练 将	(487)
练兵上	(490)
练兵下	(501)
水 师	(505)
【附】 光绪二十一年各国兵船表	(516)
船 政	(520)
民团上	(523)
民团下	(527)
卫 屯	(529)
火 器	(531)
间 谍	(540)
弭 兵	(543)
《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后序(十四 卷本)	(547)
《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后序(八卷本)	(549)
后 记	(552)

“七尺身躯大丈夫， 百年世事竟如何”

——郑观应与《盛世危言》

在灾难深重而又繁杂纷乱的近代中国，郑观应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而又颇值得评议的人物。在纪念戊戌变法百年之际，能够在此介绍郑观应与他的《盛世危言》，是极有意义的。

一、“谪降尘寰八十秋，夙怀五愿几绸缪”

(一) 郑观应生平事迹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日益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屈辱境地。就在这万家墨面、水深火热的危难时刻，有一位青年思想家振臂挥舞起了维新改良的大旗，举槌擂响了“商战”“兵战”的战鼓，高声呼喊出了要开议院、制宪法、抓教育的新声，一时震撼神州大地，他就是近代中国的焦点人物之一——郑观应。

然而，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郑观应的身世却始终处于若明若灭之间。直到1982年起，夏东元先生连续三版的《郑观应》(旧名《郑观

应传》，终于揭明了这位风云人物的八十度春秋。

郑观应，原名郑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又号居易、杞忧生，晚年又号罗浮待鹤山人（或简称“待鹤山人”），广东省香山县雍阳乡人，生于1842年7月25日，卒于1921年6月14日（此日期承夏东元先生告知，所据为《申报》1921年6月15日所刊郑观应的讣告，易惠莉《郑观应评传》已首次正式采用）。

郑观应的家庭是一个小地主土人世家。据他自己所述，“先曾祖璧公性耿直，胆识兼优”，曾为祖坟地与富豪争讼而得胜。先祖鸣岐公俭朴寡言，敦品励节，均不屑以寻章摘句为能。”对郑观应影响最大的是他父亲。郑观应心目中的父亲，“生秉异姿，夙承家学，读书过目成诵，藏书颇富，手自校讎，丹铅殆遍，然澹于进取，敝屣科名，设帐授徒。从游者多享盛名，各有建树。手录先贤格言，编辑成帙，名《训俗良规》，籍以振聩发聋。一言一行，动为世法。性孝友，重然诺，慷慨好义，有古杰士风。”（以上见《盛世危言后编·先考荣禄大夫秀峰府君行状》。）

郑观应从小受到传统的家庭教育，家庭对他的影响极大，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他此后一生的思想发展。在17岁那年，他曾参加过一次科举考试，因为没有中举，也就预示着他不再走读经仕途的旧路。落第后的郑观应很快就走上了学贾经商的道路，他的几个弟弟也相继走了这条路。

1858年，年仅十六七岁的郑观应只身离开故乡，千里迢迢远赴上海，开始了他的经商实业生涯。当时的上海，只是开埠十多年的一个新兴小城。但因为是新兴的，所以很有活力，尤其是外国洋行足称全国之最。在这些洋行中，自然不乏历来善事商业的广东人（包括郑观应的乡人与亲朋）。郑观应到上海以后，就是先在他的叔父、新德洋行买办郑廷山处寓居并“供走奔之劳”。在工作之余，还开始学习英语，为今后的商务与学习打下了外语基础。

次年，他在曾寄圃与徐钰亭、徐润等人的荐举下，进入了当时在上海也属一流的宝顺洋行任职。由于曾、徐等人在洋行中身居要职，加之郑观应本人的勤勉努力、聪颖过人，很快就在宝顺洋行站稳了脚跟。特别是 1859 年冬，他在随洋人坐帆船北上天津考察时表现出了极度的吃苦耐劳精神，深得洋人的赏识，回沪后即被任命主管丝楼及兼顾轮船揽载等事务，成了一名真正的买办。工作之余，他还自费进传教士傅兰雅所办的英华书院读夜校，继续学习英语。

到 1868 年，宝顺洋行在与其他洋行的竞争中落败而倒闭，但郑观应在宝顺的 10 年中毕竟是学到了诸多的实业本领，也建立起了一定的社会交往圈子，还积累起了一定的资金实力，所以在宝顺洋行倒闭不久，就与卓子和一起承办了和生祥茶栈。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郑观应在宝顺的 10 年中见到了常人不易见到的洋行内幕，这对他的思想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与曾寄圃、徐润等身为高级买办不同，郑观应不仅只是一个小买办，而且在思想上也不是一味地只想升迁与赚钱，而是还保持着几分清醒，能对身处列强进逼下的苦难祖国与风云变幻中的世界有几分思索考虑的余地。他在宝顺时学习外语，就不仅只是为了“业精一艺”，“多获薪水”，更是为有益于自己“究心泰西政治、实业之学”（《香山郑慎余堂待鹤老人嘱书》、《后编·稟商条陈六弊请通饬各总商会举调堂员互相砥砺事》）。他的思考，也终于结出了最早的果实——《救时揭要》。

过了两年，由于茶客们欠帐过多，郑观应、卓子和为了避免破产而不得已主动停业。在承办茶栈的同时，郑观应又投资公正轮船公司与经营荣泰驳船公司。在和生祥茶栈停办以后，他还投资过盐务，担任过扬州宝记盐务总理。由原宝顺洋行“气拉渡”轮船船主麦奎因担当总船主的太古洋行在 1873 年创立后，麦奎因力邀郑观应主持公司业务，郑观应就在次年 2 月出任太古的总理兼管

帐房、栈房等职。由于郑观应的经营有方，在首期合同的3年之中，使得公司获利甚丰，所以公司与郑观应又续签了为期5年的合同。

此时的郑观应，由于身任高级买办，年薪、红利等收入相当丰厚，在进入19世纪80年代以后又开始投资于近代的民族工业（以洋务派实业为主）。他的投资企业有轮船招商局与机器织布局，以及矿务、电报、造纸、钱庄等，甚至连种植、畜牧也有投资。于是，郑观应又成了颇具声望的民族资产阶级。然而，尽管郑观应的地位与财富有了如此之大的上升，但却依然不失其知识分子的先锋本色，而且其思想的革命性、敏锐性、成熟性都有了更大的进展。1880年出版的《易言》，就是郑观应在《救时揭要》之后思想发展的新硕果，可以使人明显地看到他的思想比《救时揭要》有了质的飞跃。《易言》的出版，是郑观应资产阶级维新思想诞生的重要标志。

就在郑观应在太古洋行才华初展的时候，轮船招商局的官商们也注意到了这位才智出众的青年实业家，因为他们正缺乏这样的人才，就向郑观应伸出了召唤之手。轮船招商局本是由李鸿章等洋务派所创建的官督商办企业，初期的业绩尚可，但由于种种原因（其中包括经营人员德才不佳），后来就陷入了“亏耗颇巨”的危难局面，因此就急需象郑观应这样内外精通、才干出众的经营人才。而此时的郑观应却倍感为难，因为一来太古洋行无论在物质上还是权利上都待他不薄，使他感到若是另投他门在情面上总有过意不去的感觉。而如果进轮船招商局，经济上的损失尚在其次，关键是在作为官商的职权往往是操纵在那些并不懂商务的官僚手中，直接经营者往往是处处受制，难以真正施展才能，还要经常成为背黑锅的替罪羊。郑观应自知不是一个善于曲意钻营奉承的人，所以在内心中颇不愿意到这类企业中去。

然而，郑观应最终却决定改换门庭，离开太古而到了轮船招商

局,原因何在呢?原因就在于郑观应毕竟是一位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在郑观应的内心深处,国家利益最终是至高无上的。国家正处于危难之际,振兴民族实业就是爱国救国的当务之急。所以,在经过反复权衡思虑之后,郑观应最终还是决定舍个人而为国家,毅然离开了太古而到轮船招商局赴任。今天看来,郑观应的这一举动,并不只是一个爱国的行为,而是在他的个人发展道路上,将起着某种重要的意义。郑观应的买办生涯就此告终,并从此为振兴民族工商业而竭尽全力,这对他形成维新改良思想体系势必有着重要的作用。

郑观应正式进入轮船招商局是在 1882 年 3 月,先是担任总局帮办,次年 11 月即被提升为总办。郑观应进入招商局之初,曾提出过“救弊大纲”16 条,对招商局的组织机构、人事安排、议事决定、赏罚举措等都提出了改革旧弊的新举措,其核心要点是引进贯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经营方式。由于种种原因,郑观应的这些改革建议没有被采纳。幸好郑观应对此早有思想准备,故而并不因此而灰心丧气,而是在具体的业务中倾注更大的精力,发挥更大的才智,使得招商局的面貌终于有了较大的起色。与此同时,他所投资并参与策划管理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电报局等也都取得了良好的业绩。而所有这些业绩,都融入了郑观应的心血与才智。

正当郑观应在招商局大展身手的时候,1883 年秋冬之际,中法战争却正面临一触即发的危急时刻。当时,有一位曾与郑观应共事过的王之春正在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身边任职,他向彭玉麟荐举了郑观应,经彭玉麟上奏朝廷而被旨准,于是郑观应就被调到了广东军营。1884 年 3 月 15 日,郑观应到达广东军营。这时,正逢当时从德国购置的 25 门火炮被香港总督扣留,郑观应立即被委以重任,赴港交涉。郑观应通过自己在香港的关系,仅 4 天时间就顺利完成了任务。6 月,他又受命往西贡、暹罗、金边、河内等地进